

战争与道德记忆

向玉乔

(湖南师范大学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军事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是战争道德记忆。战争是人类难以彻底医治的伤痛,但也给人类留下了大量战争道德记忆。探究战争中的道德记忆,不是要为战争进行道德辩护,更不是要美化战争留给我们的道德记忆,而是要论证战争与道德记忆的紧密关联性,并且推动人们从伦理的角度深刻认识战争的内涵、本质和特征。战争道德记忆具有双面性。由战争催生的善多种多样,由战争产生的恶也五花八门,因此,战争道德记忆是一副善恶交织的图景。

关键词:战争行为;英雄道德记忆;战争道德记忆;军事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20)02-0062-08

人类对战争的认识是矛盾的,对待战争的态度也是矛盾的。有些人将它视为人类生存活动的必要内容,认为它是人类解决社会矛盾特别是国际矛盾的必要手段,肯定它的道德合理性,并称之为一种“善”;另一些人则将它视为人性恶的外在表现形式,认为任何形式的战争都不具有道德合理性,并称之为一种“恶”;还有些人将战争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认为前者是善的,后者是恶的。我们主要倾向于采纳第三种立场,但我们无意于此展开深入系统的论证,而是主要致力于揭示和解析战争与道德记忆的紧密关系。

一、战争行为:应该受到人类道德法庭的审判

战争是人类难以彻底医治的伤痛。不同时代的人类都宣称不喜欢战争,却在不断发动战争。人类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发动战争,以至于战

争的硝烟从来就没有在地球上真正消失过。纵然是在今天,当我们躺在床上酣睡之时,战争正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进行着。战争似乎也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否则,它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地伴随着我们?战争一旦爆发,它就会将很多人拖入面对死亡考验的边缘状态,并且给他们留下刻骨铭心的创伤记忆。

战争产生于人类进入社会状态之后。在前社会状态,自然万物在自然界都是平等的。一方面,它们都依照自然法则而存在,自然法则对它们的制约性是平等的;另一方面,自然界一视同仁地对其进行他律性约束,将其存在纳入同等的不自在状态。自然法则就是人们所说的丛林法则,其实质是优胜劣汰的进化规律性。在自然法则的制约之下,自然万物弱肉强食,它们之间的猎杀野蛮而残暴,但那种猎杀无论达到何种野蛮、残暴程度,都无法与人类在战争中的自相

收稿日期:2019-12-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道德记忆研究”(19ZDA034)。

作者简介:向玉乔,男,湖南麻阳人,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残杀相提并论。

人类在战争中的自相残杀存在两种状况。在冷兵器时代,由于武器本身的杀伤力相对有限,人类相互残杀的惨烈程度相对较低。在古代,两军交战的时候甚至显得比较“文明”。一方面,交战双方必须首先下战书,然后才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另一方面,在战场上交战之前,双方也必须首先通报将帅姓名,并击鼓进军,才能开战,而如果一方或双方鸣金收兵,交战双方就应该停止进攻。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无疑具有血腥味,但历史地看,它带给人类的伤害是相对有限的。与古代战争不同,现代战争不仅在规模上变得更大,而且在残酷程度上变得更高。它采取的多为“闪电战”模式,其核心要义是强调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方式达到摧毁性打击的目的。现代武器是现代战争的必要条件。它们的杀伤力远远强于冷兵器。一支箭往往只能射杀一个人,而一枚导弹可以杀死成千上万的人。一枚核弹甚至顷刻之间可以将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杀死。

我们在现代战争和古代战争之间进行比较,并不是要凸显后者对前者的优越性,更不是要证明后者比前者好。在我们看来,所有战争都是残酷的,正义战争也不例外。一切战争都具有人类自相残杀的性质。正因为如此,人类在发动战争的时候应该慎之又慎。

战争是人类生存的一种“边缘状态”。它会将人类投入死亡的严峻考验之中。在战争中,人类必须面对生死问题。孙子曾经说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其意指,军事是国家大事,事关百姓生死和国家存亡,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并对它展开深入研究。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战争事关人类的生死,为什么我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争呢?

战争属于军事的范围。什么是军事?它是政治的特殊表现形式;或者说,它是政治斗争

的延续;更进一步说,它是人类解决政治矛盾的极端方式或手段。军事不仅服务于政治,而且是政治的重要内容。另外,军事的核心问题是战争问题,因为人类的一切军事活动都是围绕战争问题而展开的,因此,战争问题本质上也是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都是围绕政治利益博弈展开的。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政治利益诉求,不同党派也具有不同的政治利益诉求,因此,阶级利益之争和党派利益之争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这两种政治利益之争尚可以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它们就不会演变成战争;一旦超出和平协商的范围,它们就会演变成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内战就是国共两党的党派利益之争演变成战争的结果。在国际层面,政治利益是通过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形式来体现的。同样,如果一个国家与另外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之争尚可以通过和平协商的手段予以解决,它就不会演变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但一旦超越和平协商的范围,它就会演变成国际战争。如果国际政治利益涉及众多国家,国际战争甚至会变成世界大战。世界大战本质上是不同国家利益集团为了争夺国际政治利益而发动的世界性战争。

战争确实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既然战争本质上都是围绕政治利益之争而展开的,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分就是建立在人们对政治利益的正当性的认知和把握基础之上。正义战争基于正当的政治利益诉求而发动,而非正义战争则基于不正当的政治利益诉求而发动。侵略战争都是非正义战争,因为它们都是出于不正当的政治利益诉求而发动的。日本20世纪30、40年代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就是一场典型的非正义战争。在那场战争中,日本不仅没有开动战争机器的正当理由,而且在战争期间犯下了滔天罪行。日军所到

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甚至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的罪恶事实。日本在战争期间到处打着建立“亚洲共荣圈”的政治旗号,企图为它图谋的政治利益贴上“合道德性”标签,但它侵略他国、谋取不正当国家政治利益的阴谋昭然若揭。相比之下,亚洲各国为了抵御日本的侵略而发动的卫国战争则是正义战争。

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战争性质的认识,但它所揭示的并不是战争的全部特性。事实上,一切战争都是残酷的,残酷性是战争的一般特性。战争机器一旦开动,生灵涂炭就会成为常态,人类对生命意义的认知就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在和平年代,人们可能普遍以“健康长寿”作为人生价值目标,但一旦进入战争状态,“英勇牺牲”就会成为人们普遍推崇的一种美德。在战争中,交战双方都会要求士兵奋勇杀敌、不怕牺牲。战争会造成士兵死伤,甚至可能造成无辜百姓死伤,因此,它留给人类的多为创伤记忆。

战争是创伤的象征。它不仅仅会摧毁生机勃勃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会给人类造成严重精神创伤。投身于战争中的人会深切地感受到人类生命的脆弱。他们要么必须为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拼杀,要么必须忍受目睹战友战死沙场的巨大痛苦。战争一方面将人们投入死亡考验的边缘境界,另一方面使他们遭受巨大的精神折磨。经过战争考验的人大体上有两种:一种人的精神变得无比强大;另一种人的精神陷入严重病态。在美国,著名文学家海明威是世界大战的幸存者,但他回国之后无法从战争的创伤记忆中摆脱出来。他在文学作品中以各种方式表现“死亡”主题,在现实中则通过酗酒、淫乱等方式来麻醉自己。当他发现这些方式还不足以消除战争创伤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他没有死在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但他仍然被世界大

战拖入了死亡深渊,或者说,他最终是被世界大战杀死的!

战争给人类留下了大量创伤记忆,这一方面增强了人类对战争的恐惧感,另一方面也推动人类反思战争的道德合理性问题。战争带给人类的大多为灾难,留给人类的大多是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生死离别的创伤记忆,因此,它不是一个具有亲和力的概念,而是一个让人恐惧的概念。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在发动战争方面往往是十分谨慎的。战争留下的创伤记忆更使人们怀疑战争的道德合理性。从伦理的角度来看,战争并不具有必然性;或者说,战争并不是人类解决国际争端的唯一选项。

“战争”是人类发明的一个概念,也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生存方式。非人类动物不会发动战争,它们只会在本能的驱动下去捕杀猎物。虽然它们的猎物捕杀通常是血腥的、残暴的,但是由于它们完全合乎自然法则,我们不应该对它们进行道德谴责。与此不同,人类一旦发动一场战争,无论其规模多么小,它的意义都是非人类动物的任何一次猎物捕杀无法相提并论的。人类发动的任何一次战争都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非人类动物在本能驱动下进行的猎物捕杀行动。最重要的是,战争是一种人类行为,它应该受到人类道德法庭的审判。

战争是军事学研究的对象,也是军事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军事学以研究战争问题为核心主题。具体地说,它研究战争的本质内涵、特征、规律性、方法等内容,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深化对战争的认知。然而,军事学所能提供给人们的是关于战争的事实性信息,它不对人类的战争行为作出道德价值判断。由于军事学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它对战争的研究就具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军事伦理学的出场就是为了弥补军事学在这方面存在的不足。它会突破军事学对人类战争行为所持的价值中立态度,深入发掘和

揭示战争的伦理意蕴,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人们对战争的认识、理解和把握。

军事伦理学对战争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侧重于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在战争中是否应该讲道德?从军事学的层面来看,人类所发动的任何一场战争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残酷性,但我们无需对它做出道德价值判断。然而,从军事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总是带着一定的道德价值观念发动战争,因此,战争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研究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就是研究它是否合乎伦理的特性。

军事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是战争道德记忆。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军事伦理学不是要强调战争的道德合理性,而是要研究避免战争的伦理空间。要避免战争,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应该不断用战争道德记忆来警示人类。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可以通过战争道德记忆得到传承,并对后人发挥强有力的警示作用。我们发动过一场又一场战争,但那些战争除了给我们自身带来灾难之外似乎没有提供什么。在人类社会,历来存在好战分子,他们对战争抱持强烈信念,认为战争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最有效手段,甚至以发动战争为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都是疯狂推崇战争的人。他们不仅愿意为战争而生,而且愿意为战争而死。在他们的眼里,战争是强国的权力,而夺取战争的胜利是无比荣耀的事情。好战的人会以好战为美德,但他们所能留给人类的只能是可怕的战争道德记忆。

二、“战争英雄”的争议性与英雄道德记忆

人类具有崇拜英雄的传统。中西方最早的英雄都是通过神话得到呈现的。在我国,最早的英雄是开天辟地的神——盘古。根据中国民间传说,天地未开化之时,整个宇宙一片黑暗。盘古生于黑暗的宇宙之中,但他不能忍受黑暗,

于是用自己的一颗牙齿作为斧头,以之劈向四方,逐渐开辟出高远的天空和辽阔大地。这一努力历经了一万八千多年。盘古因为完成开天辟地的伟业而成为中华民族崇拜的第一位英雄,并因此而进入中华民族的集体道德记忆。他敢为人先、勇于开拓、甘愿牺牲的精神被中华民族代代传颂。在西方,悲剧英雄普罗米修斯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根据古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与宙斯抗争,从宙斯那里盗取火种,将火种赠送给人类,并赋予人类智慧,教会人类劳动技能,从而使人类脱离了动物状态,但他因此得罪了天神,遭到了天神的严惩,被捆绑在偏远而荒凉的高加索山上。普罗米修斯表现出反抗暴力和伸张正义的坚强意志。宙斯曾经派遣神使对他进行威逼利诱,但他始终保持不畏强暴、为人类伸张正义的坚定信念,不愿苟且而活。普罗米修斯在西方人的集体道德记忆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最早的人类英雄是那些敢于战天斗地的人物,即敢于与自然界抗争、搏斗的人物。在诞生之初的远古时代,人类必须与猛兽、自然灾害等奋力抗争才能生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具有这种勇气。由于对猛兽、自然灾害等缺乏了解,一些人在它们面前退缩不前,甚至惊恐万状,而另一些人则表现出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等英雄品质。后一种人就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英雄人物;或者说,他们是人类英雄的原型。

战争出现之后,人类社会开始拥有另外一种英雄,即战争英雄。这种英雄是在战争中产生的,因而必须通过战争的语境才能得到认知和理解。战争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日常矛盾,而是党派与党派、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殊死博弈。在战争中,无论是交战双方的远程搏杀,还是士兵之间的短兵相接,都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战争是一种边缘境界,因为它会将众多的人投入死亡的考验之中。可以说,进入战争就

是直面死亡的考验。战争最能考验人类的意志、智慧和能力。只有那些意志坚强、智慧高超或能力过硬的人才能够通过战争的考验。在战争中诞生的英雄大都是意志坚强、智慧高超或能力过硬的人。

意志坚强的战斗英雄不怕死,在战争中敢于冲锋陷阵、拼杀搏斗,往往表现出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智慧高超的战斗英雄擅长于谋略,能够在战争中以智取胜,往往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智慧、领导智慧和指挥智慧。能力过硬的英雄或者掌握超常的技能,或者经验丰富,或者具有非凡的直觉能力,能够在战争中灵活机动地获胜。有些英雄甚至可能将意志坚强、智慧高超、能力过硬等优点集于一身。战斗英雄可以有多种,其英雄品质也不是铁板一块,但他们在一个方面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是己方的保护者、敌方的消灭者。

人类在战争中对英雄的崇拜导致了恩格斯所说的“英雄时代”。^[2]在英雄时代,部落与部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人类为了掠夺彼此的土地、财富、奴隶等卷入战争,在战争中战绩辉煌的人被奉为英雄,受到族人的赞美、崇敬和爱戴,而那些在战争中表现懦弱的人则被视为懦夫,并受到族人的轻视。

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战争从来就没有真正断绝过,人类对战争英雄的需要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每一场战争爆发的时候,英雄就会成为人类社会的内在需要,并成为交战双方努力赢得战争的希望所在。战争是英雄的诞生之地,也是英雄的用武之地。或者说,英雄是战争的一项重要成果。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场战争中,他们都是最引人注目的风景。

战争英雄是每一个民族都需要的人物。一个民族一旦卷入一场战争,它对战争英雄的需要就会变得非常紧迫,因为没有战争英雄的民族是难以赢得任何战争的。在一场具体的战争

中,交战双方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拥有战争英雄的状况。任何一方要赢得一场战争,它都必须拥有数量众多的战争英雄。人类历史上的每一场战争都是在战争英雄的带领下完成的。战争英雄的存在,不仅是战争意志和士气的象征,而且是战斗力的象征。一部人类战争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战争英雄的历史。

战争英雄是所有民族需要的旗帜,但不同民族对战争英雄的认知和定义不尽相同。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对战争英雄的认知和定义就存在着显著区别。一般来说,中华民族的战争英雄多为悲壮型的,他们往往深受儒家伦理精神的影响,多出现在民族危难之时。古代的岳飞、文天祥、戚继光这样的英雄,近现代的林则徐、张自忠、黄继光、邱少云等等也是这样的英雄。另外,中华民族的战争英雄多为防御型,他们大都是在保家卫国的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相比之下,大和民族多推崇武士道型和扩张型的“战争英雄”。他们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具有主张对外扩张的侵略精神。

中国历史上的战争英雄都是“逼”出来的。中华民族自古热爱和平,不好战,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与其他民族发生冲突。与这种社会背景相一致,中华民族的战争英雄都是在防御性战争中“冒”出来的。汉朝是因为遭到匈奴侵略才派遣霍去病主动出击、纵兵大漠,而霍去病则是因为抵抗侵略才有机会创造神武事迹,并成为中华民族英雄,但他年仅23岁就病逝了。南宋岳飞抗金的故事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但他不仅遭到秦桧、张俊等奸臣诬陷,而且最终与他的儿子岳云一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

相比较而言,日本的“战争英雄”都是野心家、侵略者。他们大多为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者。由于国土狭小、资源匮乏,日本历来采取进攻性、扩展性的国家战略,并表现出侵略成性的国家行为特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日本顽固地

坚持对外扩展战略和走军国主义道路具有必然性,它反映了大和民族争取生存空间的国家本能。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日本战争英雄”,如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武藤章、坂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都是外向的、进攻型的人物。这些人都是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者和甲级战犯,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但他们在日本被作为“民族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

显然,不同民族不仅具有不同的战争英雄观,而且对战争英雄具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被一个民族称为战争英雄的人可能恰恰是另一个民族要惩罚的战犯;反过来说,被一个民族称为战犯的人可能被另外一个民族作为战争英雄来供奉。这就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一种公认的评判标准,人类对战争英雄的认知和评判必定会陷入误区。

人类的道德价值判断总是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武藤章、坂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等日本军国主义者判为甲级战犯,这体现了国际正义和世界人民的国际道德共识。大和民族将这些罪恶深重的甲级战犯作为“战争英雄”加以供奉,这充分反映了他们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意识和侵略本性。

战争英雄很容易通过人类的道德记忆得到流传。他们具有“英雄事迹”,因而很容易受到人们的称赞和敬重,并且很容易被人们纳入其道德记忆的内容框架。在不同民族的道德记忆中,都包含有关于战争英雄的道德记忆内容。问题在于,人类关于战争英雄的道德记忆中存在很多有争议的内容。战争英雄具有民族性特征,关于战争英雄的道德记忆也具有民族性特征。

英雄道德记忆的价值是相对的。这是指,它主要对相关的民族或国家有价值。既然一个

民族的战争英雄是另外一个民族的敌人,后者就很难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正因为如此,日本人不可能发自内心地尊重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张自忠、黄继光、邱少云等中华民族的战争英雄。当然,中华民族更不可能将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武藤章、坂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等人视为战争英雄。毫无疑问,这些历史人物都会进入人类的道德记忆,但他们在人类道德记忆世界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时间必将证明,只有那些真正造福于人类的战争英雄才配受到人类的长久道德记忆,那些对人类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充其量只能作为人类历史的反面教材而存在于人类的道德记忆之中。

不同民族对战争英雄的认知和定义不尽相同,并且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但这绝对不意味着人类社会没有评价战争英雄的正确标准。“战争英雄”会被打上民族性烙印,但这并不是指所有民族对“战争英雄”的认知和定义同等正确,更不是指“战争英雄”的内涵仅仅是相对的。人类对“战争英雄”的认知和定义肯定具有普遍性的一面;换言之,人类对“战争英雄”的道德价值认识、道德价值判断、道德价值定位和道德价值选择必定具有能够反映其普遍意志的维度。

要确立关于“战争英雄”的普遍道德价值认识、道德价值判断、道德价值定位和道德价值选择是很难的,但它是必要的。如果人类不能在这方面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我们基于民族意向性树立的战争英雄完全可能是虚假的,甚至完全可能是罪大恶极的罪犯。正因为如此,大和民族将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武藤章、坂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等甲级战犯供奉在他们的靖国神社,那些也不可能成为人类普遍认可的“战争英雄”。只要人类的良知没有泯灭,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就会被永远钉在人类社会的耻辱柱上,并受到人类世代代

的道德谴责。如果说他们的存在也具有某种道德价值的话,这是指他们为人类提供了应该永远被铭记的道德教训:人类永远不会从道德上宽恕那些对人类犯下滔天罪行的战争犯!

三、战争道德记忆的双面性及其影响

战争是人类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极端手段,残酷而可怕,因此,任何一个有集体理智的民族都不会轻易开启战端。战端一开,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战火所到之处,必定是水深火热,甚至是哀鸿遍野。有的战争甚至会将人变成麻木不仁的杀人机器,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彼此全然不顾同胞之情。战争留给我们的有人类向善、求善和行善的道德记忆,也有人类向善、求恶和作恶的道德记忆。战争是一把双刃剑,人类将它握在手中,既开辟善的道路,也开辟恶的道路。

由战争催生的善多种多样,由战争产生的恶也五花八门。在战争中,有保护亲人、同胞、战友的善德,也有出卖亲人、同胞、战友的恶行;有舍己为人、舍家为国、保家卫国的美德,也有自私利己、为家弃国、卖国求荣的丑行;有同仇敌忾、奋勇杀敌、杀身成仁的英雄,也有敌我不分、明哲保身、奴颜婢膝的小人。战争最能考验人的德性和品行,也最能反映人在道德修养上的差别。每一场战争都会给人类留下诸多道德记忆,但它所留下的绝对不是清一色的光荣的道德记忆。

战争道德记忆具有双面性,这是由战争的双面性质决定的。作为人类的一种发明,战争与人类的所有其他发明一样,既有有利于人类的一面,也有有害于人类的另一面。战争有时是必需的。在一个国家受到侵略的时候,抵抗侵略的战争就是正义战争,它的发生也具有道德合理性基础。然而,正义战争爆发也会给人类带来很多损失,甚至牺牲。正义战争通常是在人类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爆发的,因为人们都

清楚地知道,战争都是残酷的,会给人类带来伤害。

美国发动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国就陷入了两难困境。一方面,美国“醉翁之意不在酒”,它表面上侵略的是朝鲜,实际意图是要围堵,甚至扼杀社会主义新中国;另一方面,一旦出兵朝鲜,刚刚从抗日战争和内战苦难中摆脱出来的中华民族必定作出巨大牺牲;因此,在是否抗美援朝的问题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经历过艰难的选择。虽然党中央最终决定发动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但是作出这一决定的过程是艰难的,因为党中央深知,它一旦爆发,中华儿女就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正因为如此,真正具有智慧的军事家绝不是好战之徒,而是将能够避战视为最高的智慧。《孙子兵法》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3]其意指,最高明的军事手段是挫败敌人的谋略,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再次是挫败敌人的军队,最不明智的是攻破敌人的城池。攻打城池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性。军事更是事关大利大害,因而更不能等闲视之。正如《孙子兵法》所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4]军事是以战争作为第一要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应该以战争作为最高目的。既然战争有利有害,军事家应该尽力趋利避害,而不是趋害避利。权衡利害是军事家必须关注和重视的要务。

战争利害攸关,但它所涉及的利害问题很复杂,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一个人、民族或国家认为有利的战争对于另外一个人、民族或国家来说完全可能是有害的;反之亦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只看到战争对大和民族的有利

性,看不到战争对大和民族的有害性。直到中国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时候,日军节节败退,日本本土遭到原子弹的轰炸,他们才开始意识到侵略战争对侵略者本身的危害性。日本军国主义者都是战争机器,他们以发动战争为利、为荣、为乐,图一己之私,不惜将他国和本国的广大民众拖入战争的灾难之中。他们留给后人的是恶的道德记忆。他们在侵略战争中烧杀抢掠,甚至举行杀人比赛,用令人发指的丑陋行为彰显人

性之恶,这不仅败坏了大和民族的整体形象,而且应该永远受到人类的道德谴责。

参考文献:

- [1][3][4] 孙子. 孙子兵法[M]. 陈曦,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2, 41, 23.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24-136.

[责任编辑 杨捷]

War and Moral Memory

XIANG Yuqiao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ral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An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 of military ethics is moral memory of war. War is an incurable wound, but it also leaves a lot of moral memory. To explore the moral memory in war is not to defend the morality of war and beautify moral memory of war, but to demonstrate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war and moral memory, and to encourage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Moral memory of war is two-sided, with the good and evil of war being varied. It is a mixed picture of good and evil.

Key words: war behavior; heroic moral memory; moral memory of war; military ethics